

# 熟人社会、阶层分化与共振的公共空间\*

——一个理解阶层意识形成的微观经验

陈文琼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 基于东莞芳村的微观经验叙事, 探讨既已分化为不同阶层的村民在其同属的熟人社会中形成阶层意识甚至阶层行动是如何可能的。第一, 熟人社会的某种特质为阶层互动提供了天然便利, 该特质即高度共振的公共空间。第二, 公共空间在熟人社会中由以人情为代表的公共生活、以广场为代表的公共场所、以集体成员为代表的公共政治经济身份、以面子为代表的公共价值等元素组成。第三, 熟人社会的阶层差别直观可视、阶层互动不可避免, 公共空间的高度共振性将阶层差别通过阶层互动强制性渗透到熟人社会的日常生活并参与公共规则的再生产。第四, 如果分化的阶层结构趋于固化, 弱势阶层失落感和强势阶层优越感的阶层意识将会在直观差别和强制互动中形成和积累。第五, 这组对立的阶层意识成为熟人社会客观存在的政治风险, 并可能以阶层冲突的形式释放其对立性。

**[关键词]** 熟人社会 阶层分化 阶层意识 阶层冲突 共振的公共空间

**[中图分类号]** C912.5; C91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2023)03-0089-10

## 一、问题的缘起

2018年10月30日至11月17日, 笔者及所在团队在东莞市芳村<sup>①</sup>驻村调研, 发现该村存在基于经济收入差异的显著且趋于固化的阶层分化, 不同阶层内部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交往圈子, 富裕群体在村庄中积累了越来越强的优越感, 贫弱群体在村庄中积累了日渐显著的失落感和自卑感, 这种对立的社会情绪在芳村一触即燃, 针对富裕群体的阶层冲突已然发生, 它以反对A在村里的公众场合跳广场舞、反对集体收入在阶层间分配不公为具体斗争目的, 以富裕阶层的表面退让为斗争结果。芳村为本文系统考察

熟人社会的阶层关系, 具体包括面对面的阶层互动、阶层意识的形成和阶层行动的发生, 提供了完整的经验叙事, 为熟人社会中阶层互动提供天然便利的特质概念化的经验支撑。

## 二、既有阶层研究的启示与本研究的理论关切

经典社会学理论的阶层研究主要有三大范式, 即马克思开创的以阶层对立为核心更关注社会冲突的研究范式, 韦伯开创的以多元分层为核心更关注社会冲突主观意识条件的研究范式, 以及涂尔干开创的以社会分工为核心更关

收稿日期: 2022-03-22; 修回日期: 2022-05-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农村土地资源整合机制研究”(21CSH012)

作者简介: 陈文琼, 博士, 讲师, 主要从事城市化与农村问题研究。

①为尊重相关学术规范, 文中村名、人名皆为化名。

注社会整合的研究范式。<sup>[1](P25-47)</sup>

我国既有的阶层研究主要有两大范式：一是重在对接层结构进行客观描述的静态研究范式，该范式一定程度上是对韦伯和涂尔干的继承，以社会整合为目的，相对回避分层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也是国内阶层研究的主流；二是重在对接不同阶层相互关系进行质性分析的动态研究范式，该范式是对马克思的继承，直面分层社会的矛盾和冲突。随着我国阶层分化日渐显著，阶层间关系的研究也理应被重视。<sup>[2-3]</sup>

阶层间关系的研究更加关注阶层间的质性关系、阶层互动、阶层意识的形成和阶层行动或阶层冲突的可能，在阶层质性关系既定的状态下，阶层互动是阶层意识和阶层行动得以形成的前提，这种阶层互动既包括同一阶层内部的互动，也包括不同阶层之间的互动。真实的社会互动是“自在阶级”转变成“自为阶级”的必要条件；<sup>[4](P159)</sup>缺乏互动就缺乏“同属于一个整体的感觉”，进而使阶层并不具备能够形成统一行动的共同体特质；<sup>[5](P64)</sup>阶层成员沟通机会越多、地理分布上越集中，就越容易被组织起来形成集体行动。<sup>[6](P185-191)</sup>

总体来看，我国宏观社会的阶层意识并未形成。当前我国阶层分化已经出现，但其还是作为一种客观经济现象存在，其主观阶层意识并未形成，是既有研究对我国现阶段阶层状态的总体判断。利益碎片化、主观阶层意识与客观职业收入等分层指标之间关联强度不大等因素被认为是主观阶层意识未形成的关键，<sup>[7](P87)</sup><sup>[8]</sup>若没有政治组织和革命意识形态的外在推动，阶层冲突就只会小范围内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发生，即外在推动是在宏观社会形成主观阶层意识的必要条件。<sup>[1](P108-109)</sup>

近几年，学界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微观社会的阶层分化，将村庄这一熟人社会作为阶层研究的微观场域，<sup>[9-11]</sup>在其中探讨阶层结构、阶层互动和阶层冲突的形式。既有研究认为，在村庄这一微观社会，阶层意识形成无需

外在推动，村庄熟人社会性质中的信息对称、互动在场、公共性和价值共享为村庄内的阶层互动和阶层意识形成提供了天然条件，<sup>[12-13]</sup>熟人社会发生了或者正发生着诸多事件或现象的阶层表达。<sup>[14-17]</sup>

既有研究给予本文的启示是：从宏观社会的阶层研究来看，它突出强调了阶层互动对阶层意识和阶层行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从微观社会的阶层研究来看，它将阶层在熟人社会<sup>①</sup>中微妙、灵动且具体的互动呈现出来，揭示了阶层互动的内在过程，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宏观社会阶层研究所缺乏的阶层互动研究。但是，既有研究未能解答一个关键问题，即宏观社会与微观社会在阶层分化和阶层意识形成之间的这种迥然差异的原因，除了通过阶层互动来解释之外，是否还存在一个中间的概念或者机制，能够更清晰的对这种差异进行表达，这也是本研究的主要理论关切。即，微观社会的阶层研究并非认为促成阶层互动的是熟人社会本身，而是熟人社会的一些特质，他们对这些特质在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贴近现象的阐述，却没有对其进行概念化的提升，而概念化提升是在微观社会与宏观社会之间进行知识迁移不可或缺的环节。本研究旨在通过对熟人社会阶层关系的系统考察，结合现有研究对熟人社会中为阶层互动提供天然便利的特质进行再梳理，并对这些特质进行概念化的提升，分析这些概念在宏观社会阶层研究中的适用性。

### 三、研究进路：共振的公共空间

人的社会性，是人必然参与社会互动并从中形塑和获得自我认知从而实现社会化的哲学出发点，人是在他人的注视下才意识到自身的，即人具备自我意识的过程是其参与到“社会世界的公共空间”之中进行社会互动的过程。<sup>[18]</sup>因此，社会互动是在公共空间中展开的，而阶层互动作为社会互动的一种类型，也不例外。

①文章没有对村庄和熟人社会做区别，在使用中，村庄也指涉熟人社会。

公共空间既是一个实体,也是一个建构性的存在,依赖社会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与相互沟通或交往。<sup>[19]</sup>熟人社会为生活在其中的人提供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熟人社会的公共空间也由生活在其中的人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建构,社会互动的内容不同,公共空间也因此具有不同的形式。同时,因为村庄熟人社会各领域之间并不独立,<sup>[3]</sup>而是彼此紧密联系,熟人社会中不同形式的公共空间存在较强的共振效应,即在一种形式的公共空间中发生的事情很快会渗透到另一种形式的公共空间之中并产生影响。因此,阶层分化在熟人社会高度共振的公共空间中所产生的影响也是系统性的,而非局部的。

### (一) 熟人社会中公共空间的基本形式

学界对我国农村公共空间主要有两种分类方法,一种是以空间属性为标准,将村庄社会的公共空间分为有固定边界的实体空间和文化范畴的非实体空间;<sup>[19]</sup>另一种是以公共空间的搭建主体为标准,将村庄社会的公共空间分为正式公共空间和非正式公共空间。<sup>[20]</sup>而熟人社会的人际互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基本领域,本文将从这四个基本领域出发,考察非实体公共空间,以求更清晰地呈现不同形式公共空间之间的传感效应,观察经济公共空间的阶层分化在熟人社会中如何向四个领域进行系统传感的。既有熟人社会研究领域,对人情<sup>[21]</sup>、村庄政治现象<sup>[22]</sup>、村庄经济分化<sup>[22] (P233-239)</sup>、面子<sup>[23]</sup>和村庄公共文化<sup>[24] (P105-126)</sup>都有关注,这些内容分别代表着熟人社会公共空间不同的基本形式,以下结合芳村经验原型分别阐述。

物理形式的公共空间是最具体的,村庄熟人社会中,公路、广场、小卖部、麻将馆、宗祠、老年人活动中心都有可能成为村民共同活动的场所,其主要特征是公共性,熟人社会的日常交往活动,通常在公共场所中开展。芳村最具活力的公共场所是集体为村民修建的广场,为村民闲暇、开展集会提供空间。

政治公共空间是村庄的核心公共空间之一,村民委员会、村民代表大会等政治组织是村庄政治公共空间的具体形式,敏感性是其重要特征,很容易受到熟人社会其他要素的影响,比如血缘认同、利益聚合或冲突、人情往来等等。芳村的政治公共空间包括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委员会和换届选举。

经济公共空间是村庄的核心公共空间,通常指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东代表大会、股东大会、公共财产和一切关乎共同经济利益的事务以及熟人社会的经济结构。芳村的经济公共空间非常发达,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高度分化且趋于固化的经济分层结构在其中最具影响力。

文化公共空间是村庄中最为本质的公共空间,通常以村民在价值追求、人生意义等终极问题回答中得到体现,传统村庄社会的文化价值是“传宗接代”<sup>[25]</sup>,但随着现代性和市场经济的渗透,村庄传统文化价值面临解体,正在被市场化的“有钱即有面子”的价值替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呼吁应该重视村庄的文化建设。<sup>[24] (P105-126)</sup>芳村以其强大的集体经济维系了村庄丰富多面的文化生活,包括篮球、游泳等体育活动,元宵灯会、重阳敬老等节日传统,从而使文化公共空间的活力得到保留和发展。

社会交往公共空间是村庄中最为日常的公共空间,最突出的代表是熟人社会的人情往来,人情不仅是社会关系的确认、更是社会关系的再建构。<sup>[21]</sup>芳村的社会交往公共空间除了人情之外,还有通过跳广场舞而组成的人际交往的圈子。

### (二) 熟人社会公共空间的高度共振效应

熟人社会的人情往来、政治、经济分化和文化价值等领域在逻辑上具有很强的关联度,<sup>[3,11-12,14,17]</sup>熟人社会的各个领域是交互影响而非孤立存在的,熟人社会公共空间的各个基本形式之间也存在着高度共振效应。熟人社会各领域之间的交互影响,根本上源于其生产、生活和政治的三位一体性,这也是村庄熟人社会与城市社区的本质区别:在传统农业型社会,这种三位一体指

的是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村庄政治均在村庄的场域中开展,它们在村庄场域中已经交织为关联密切的网;在现代化的工业村庄中,农业生产被工业生产或地租经济替代,但不变的是,三位一体关联密切的网仍然存在,甚至更有活力。熟人社会中,这张关联密切的网,是其公共空间高度共振效应的传感器。

村庄的发展越是向内用力,其三位一体性就会越发凸显,从中国不同区域正在发生的实践来看:东部沿海发达的工业村庄往往存在很强的向内用力的特点,具体表现为村民的村庄生活依然完整,且村民具有长远的在村庄生活的未来预期,村庄也与村民利益攸关,因而村民就会对发生在村庄内部的事情更加敏感;而中西部普通农业型村庄,随着外出务工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村民开始从经济上、政治上、社会生活上退出村庄进入城市,留在村庄的村民也有着进入城市的未来预期,而并没有在村庄的长远生活预期,村庄与村民的关联逐渐减弱,村民对村庄的关心也趋于淡化。两种不同的用力方向,也带来了两种不同的阶层分化格局,即中西部农村富人进城进而形成村庄内部的去分化格局,<sup>[26]</sup>以及东部沿海农村富人在村进而形成村庄内部高度阶层分化的格局,本文所要探讨的东莞芳村即为向内用力且经济上高度分化的村庄。

## 四、分层与固化:东莞芳村的阶层分化

### (一) 芳村概况

芳村共1600余村民,400来户,外来人口逾2万人,全村土地面积2500多亩,这些土地已全部开发完毕。2018年村集体经济总资产达5亿多人民币,上一年度村集体经济总收入6800万元,同年截至10月,村集体经济总收入8000余万元。2009年,芳村为村民修建的花园小区建成,每个村民有30m<sup>2</sup>的免费面积,以户为单位,超出部分向村集体支付1500元/m<sup>2</sup>的成本价,花园小区

在性质上属于村集体建的福利房,属于小产权房,市场流通性较差。全体村民迁居该小区,村民在居住上更加集中,熟人社会没有被大量的外来人口在空间上切割。因为村集体提供的福利很好,芳村村民极少有外迁农户,在地完成城市化,村民收入不再与农业相关,在居住上、生活方式上,都已然与城市无异,甚至从集体福利的角度出发,村庄对他们而言有着比城市强得多的吸引力。

### (二) 卖地与集资:芳村的集体经济开发模式

芳村的村集体经济大开发始于1992年,当时为了使“一穷二白”只有土地的芳村成为外来投资者的投资圣地,芳村必须提升自己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最迫切的任务是修路。而当时,村里没钱,政府要管的村很多且当时政府本身也不富裕,芳村迈出了非常大胆的两步,一步是面向本村村民“卖地—换钱—修路—盖厂房”;另一步是向村民集资,村集体经济开发历史进程中,芳村总共向村民集资2.2亿多人民币。第二步容易理解,下面重点介绍第一步。

芳村将规划道路两边的土地划成140m<sup>2</sup>一块的商铺用地,村干部协商出起拍价后,所有地块在村内竞价,价高者得地,最终成交价格在800到1200元/m<sup>2</sup>不等。离道路稍微远一点的土地,用来盖厂房,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招商引资,外来资本可购买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资本自建厂房;一种是永久性卖给私人,每笔交易不超过5亩,价格为300元/m<sup>2</sup>,私人盖了厂房用来出租;最后一种是集体用卖地换的钱来盖集体的厂房用来出租,换取常规化的集体经济收入。

这样的集体经济开发模式极大地推动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2000年和2004年,芳村以1992年的模式又进行了两次大开发,此后村里的土地全部都被开发完。后两次卖地过程中,价格呈直线上涨趋势:2000年时,商铺用地成交价格在1200~2000元/m<sup>2</sup>之间;2004年时,商铺用地成交价格在2000~3000元/m<sup>2</sup>之间。

在这样的集体经济开发模式下,芳村绝大部分商铺均为私人所有,厂房物业属于三个不

同的主体,即私人、村集体和外来企业主,比例约为1:6:3。芳村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集体厂房的出租收入,例如2017年的6800万村集体经济收入中,超5000万均来自于集体厂房出租收入;除了厂房之外,芳村还投资建了一所全镇最好的幼儿园,每年为集体创收近千万;筹建一栋集体产权的写字楼,出租给公司,2017年为村集体创收40余万元;筹建集体产权的商铺,2017年为村集体创收500余万元。

### (三) 务工与收租: 村民的家计模式

芳村创业者很少、村民比较保守,“半工半租、以租为主”是芳村村民主要的家计模式,家庭收入主要由租金收入和务工收入两部分构成,务工收入占家庭年均总收入比重不足1/3。

农户的租金收入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分别是自建房屋(包括少数农户的自建厂房)出租的收入、村集体经济分红收入以及村集体向村民集资每年支付的利息收入。其中村集体经济分红收入以人头计算,2017年底的分红标准是人均7000元;农户私人厂房和出租屋的租金收入存在差别,最少的一年不足1万元,最多的一年可超过500万元;利息收入,每户余钱多的借给村集体的就多,得到的利息收入就多,2017年付给村民的利息总额为1100多万元,与2017年的分红支出1130万元基本相当。若分红和利息收入在农户间都是平均分配的,以芳村400户村民计算,每户收入就超过5万元,而村民年租金收入绝大部分都在20万元及以上,已经远远超过中西部绝大部分农户的年收入。

务工收入在农户的家庭生计中所起的作用是“补贴家用、挣零花钱”。从芳村的就业情况来看,主要包括四种形式:第一种是大学生在城市从事白领工作,包括考取当地公务员的,占比10%左右,年工资收入在10万元以上;第二种是村集体内部的非市场就业机会,包括村干部、普通办事员、治安队员、花园物业管理员、消防员、保安、社会工作者、清洁工等,由村集体支付工资,并且只能由本村人担任,占比近50%,除了6名村干部年收入超过10万,其余大部分村民

的年工资收入在2~6万元之间;第三种是在村里的工厂或企业做行政厂长、仓库保管员等,实质上是村里安排在各个企业的眼线,目的是掌握工厂运转情况防止企业发生重大变故如“老板跑路”,同时在村企之间做好沟通和协调为企业理顺与当地的关系,工资由企业支付,年工资收入在7~10万元之间,占比10%左右;第四种是在市场自谋职业者,但他们不会上流水线,因为这是外地人的工作,通常是选择月薪2000~3000元的办公室文员,工作形式像白领,工资不高,却比较体面,占比30%。为了把就业机会让给年轻人,芳村规定不聘用55岁以上的村民,因此,55周岁是芳村默认的退休年龄。

在芳村村民的家庭生活安排中,工资收入主要用于平时的生活费、物业费、小孩子的零花钱,光是负担这些日常生活开支,绝大部分家庭的工资收入都捉襟见肘,常常需要拿租金收入来补贴。而租金收入主要用来积累存款,应对大额支出需要,比如买车、婚丧嫁娶、看病、买保险、就学等费用。

### (四) 芳村的阶层分化与阶层固化

形塑芳村阶层分化的核心是村集体经济开发模式:第一是竞价卖地,造成了土地要素在农户间的不均衡分配,因为农户间购买能力的差异,农户地块拥有量最多的有10多块,最少的只有1块老宅基地;第二是向村民集资,以集体经济收益给村民发利息,村中有10%的农户根本没有余钱借给村集体,不同农户参与集资的能力也不同,这意味着部分有钱借给集体的农户分享了近乎等同于集体经济分红总数额的集体经济收入。向村民集资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均衡,可以通过偿还本金且不再向村民借债的方式予以解决,而土地要素的不均衡配置格局却已然固化,因此它也是导致芳村阶层固化的主导因素。总体来看,由于地皮拥有量不同,芳村可以划分为四个阶层,这种租金收入的断层非常显著。

第一是富裕群体,他们的年租金收入在100万元以上,其中最高的两户一户为500多万、另一户为180万,总数不超过10户,是村里的绝对富

人；第二是富有群体，他们的年租金收入在50万左右，占比近40%。本文将富有群体和富裕群体统称为富人阶层，他们是芳村开得起豪车的人，该群体的后代，被称为“富二代”；第三阶层是中间群体，他们的年租金收入在20万元左右，占比近50%，这类村民虽然并没有经济上的压力，但消费豪车还是有压力，一家人的日常生活需要精打细算；第四是贫弱群体，他们的年租金收入在10万元以下，许多不足1万元，占比近10%，这类村民甚至都开不起车，也盖不起容积率更高的房子，芳村还专门开设了一些原本不必要的工作岗位，解决该群体的就业问题。

由于村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土地买卖已成既定事实，且村集体再无土地出售，过去没有钱买土地的村民，未来也不可能再买到土地，由于没有足够的租金收入，他们甚至没有钱翻建自己的老房子来增加租金收入；而有能力买土地的农户，现在也获得了更多的租金收入，翻建了更高、能容纳更多租户的出租房，进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高租金收入。尤其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当前芳村这种基于租金收入的分化结构已然固化，哪怕通过务工收入赶超，中下阶层赶超富人阶层的可能性都是极小的，因为富人阶层有着强大的资源俘获能力，换言之，即他们有优先获取好的工作机会的能力。

## 五、公共空间高度共振：可视的阶层差别与不可回避的阶层互动

阶层互动不可避免，公共空间高度共振是分析芳村阶层分化现象必须重视的突出特征。芳村400户农户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起，信息相对透明，但强大的集体经济以村民与集体之间直接的利益关系取代了过去的血缘认同，每个人与集体关联较强而户与户之间的关联很弱，是芳村社会关联的重要特征。在彼此熟悉但彼此间伦理责任不强的芳村，分化的阶层位置，是每个人在村庄中最直接的社会地位，且每个人对彼此所处的位置都很清楚，阶层之间在消费、政治

参与、社会交往甚至村庄的舆论评价中存在的差别是直观可视的。出于保护自尊心的需要，处于较低阶层的村民不愿意与较高阶层的村民打交道，但只能生活于同一熟人社会并分享公共空间的客观现实，使他们直接的甚至面对面的阶层互动不可避免，进而阶层分化随着阶层互动在村庄公共空间中产生了高度共振效应。

### （一）弱势阶层对强势阶层在经济机会的依附性

芳村在经济机会上出现了明显的阶层依附，具体表现为中下阶层对富人阶层的依附，包括工作机会上的依附和经济互助上的依附。

工作机会上的依附主要是指贫弱阶层需要依赖富人介绍工作机会。富人阶层中不少有自建厂房，在厂房出租过程中同外来投资者、政府和村干部之间有着不少打交道的机会，他们在打交道的过程中通过自荐、互予方便，通常能够给自己的子女、亲戚找到不错的工作机会，而中下阶层的村民则很少有这样的机会，但是他们也不想和外来务工人员同台竞争，而本身其实也并不具备做管理者的特殊优势，就会通过富人阶层来为自己争取这样的工作机会。

经济互助上的依附主要指贫弱阶层没有足够用来翻建房子的资金，他们需要富人的帮助。2018年是政策开口子允许建不超过7层楼房的最后一年，一栋楼花费最少也要上百万，这是贫弱阶层虽然有一处面积不小的宅基地却也只能每年仅有不足1万元租金收入的主要原因。而富人的流动资金很多，他们早就翻建了出租房，稳定了自身的高租金收入。贫弱阶层向银行贷款的能力有限，富人阶层给了他们一个合作选择，即贫弱阶层出地、富人阶层出钱，新出租房建好后，前16年的租金由出钱的富人阶层收，第17年开始房子归出地的贫弱阶层，租金收入也归出地的贫弱阶层。据村民反应，芳村2017年才建房子的农户中，“10户有8户都采取的这种办法，不找外面的有钱人帮忙，主要也是因为不认识，怕靠不住，同村的人熟悉，虽然觉得没面子，但风险小”。

## （二）社会交往的圈层化：社会交往在阶层内部结成“圈子”

社会交往的圈层化主要集中表现在两个现象层面，一是妇女闲暇，二是年轻人社交。

芳村妇女打发闲暇自发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广场舞队伍，此处对两支队伍的队名做学术处理，一支称为A队，另一支称为B队，A队的成员都很富有，B队的成员大都经济拮据。<sup>①</sup>A队在芳村住进农民花园前就成立了，是村里最有闲暇的人，不用工作，经济上也宽裕，经常组团到城区专门的舞蹈培训中心去学习，回到花园也会每天在广场上练习，她们会购买统一的漂亮服装，整体看上去非常专业，A队常在一起跳舞的有14个人，也欢迎新人加入，可是有人加入后在跳舞水平、装备水平上常常跟不上队伍而被嫌弃，后来就自觉退出了，只有那些有时间练习、有钱请老师教学且有钱购买装备的人才渐渐能留下来。专业的A队，每年都会参加各种各样的舞蹈比赛，也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B队除了几个特别爱好者，其他成员都不固定，在芳村搬进农民花园后才渐成规模，人员有很大的流动性，谁今天有空又想跳舞就去广场上跳舞，明天要工作没空就不去了，导致B队舞蹈并不专业，“都是跟着电视、视频学的”，带有很强的健身性而非审美性，没有购买统一的服装，也没有人在意其他队员的舞跳得好不好，“都是活动活动筋骨”。她们现有的统一服装是代表芳村参加全镇组织的文娱活动时，村集体支持的。

年轻人社交上的圈层化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的。芳村一贫弱阶层的妇女说，“我儿子以前读书的时候埋怨我，说他的同学每周都有500块的零花钱，但是他最多只有200块，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和别人一起玩，别人穿的都是名牌，而自己穿得很普通，觉得自卑”，还有一位年轻人也表达类似观点，“虽然我家每个月也有一两万的租金收入，但我的富二代朋友，他老爸一个月给

他的零花钱就一万多，年轻人心里都敏感，觉得有差距，他们那些有钱的，随便出去吃吃喝喝玩一下就是2000以上的开销，下了学就开父母给买的豪车，自然而然我们就和他们玩不到一起去了，因为玩不起”。

## （三）文化价值对贫弱者的阶层排斥

文化价值上的阶层排斥主要是指，在阶层分化的芳村，富人阶层越来越有面子，而中下阶层越来越没有面子。芳村有两个小故事，鲜活的呈现了文化价值的阶层排斥。

一个是A跳舞队每年都能代表芳村参加各种比赛并获得名次，而B跳舞队要么组不齐队伍参加不了比赛，要么参加了比赛也拿不到名次。A队和B队，都是芳村村民自发组织成的，她们都能够代表村集体，村干部不会厚此薄彼，镇上和市里每年都会组织舞蹈比赛，芳村通常都会报两支队伍上去，而最终A队经常获得第一名的成绩，并且她们的组织带头人，还被选为代表全镇的东莞市文化宣传大使；而B队总是拿不到奖，“她们心里积累了许多怨气，也越来越自卑”，她们与A队之间的隔阂，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心理上的和文化上的。

另一个是，村里贫弱阶层的村民因为脆弱而敏感的自尊心，不经常在公开场合活动，以至于在封闭式管理的花园小区，保安不认识他们，他们常有在出入时经历身份盘问的体验，甚至有请村干部出面证明身份的。而富裕群体相对体面，花园工作人员基本都认识，即便是步行出入花园，也能迅速被保安认出来，而无需接受身份验证。但村里的不少贫弱阶层，他们逐步缩小了社交圈，这是因为“有钱人说话和没钱人说话是不同的，有钱人说话的声音大，聊的都是昂贵的衣服、旅游看到的外面的世界，但是我们能都不敢出去，怕花钱，现在别人家孩子结婚我也不去了，我踩单车的不好意思和别人开车的一起玩”，久而久之，他们成了村里“没头

<sup>①</sup>这里的A队，在芳村村民间，通常被叫做“富太太”队，因为都是有钱人家的富太太；B队，则被叫做“老太太”队，并不是因为他们年纪大，相反，他们的年龄大都在30岁到60岁之间，被叫做“老太太”队，是他们在和“富太太”队作比较的时候，因为自卑和敏感，而自称“老太太”队。

没脸”的人，和富人的“有头有脸”形成了鲜明对照。

## 六、阶层意识与阶层冲突：熟人社会阶层分化的政治共振效应

以行政村为单位的熟人社会，其阶层分化效应会通过熟人社会高度共振的公共空间向政治领域传导。芳村的阶层分化已经在不同形式的公共空间的互动下形成了共振效应，让不同阶层形成了各具特点的阶层性格，主要表现为富人阶层的自信、悠闲与傲慢，贫弱阶层的自卑和中间阶层的谨小慎微。这些阶层性格形塑了不同阶层的自我意识，并且缺乏土地和利息收入是中下阶层共同的两个致贫原因，当有机会改变现状的时候，他们有着能够因为共同利益而被组织起来一同采取行动的可能，这种行动本质上是阶层行动或阶层冲突，从而阶层间在任何领域的冲突和矛盾在熟人社会都可能通过公共空间的共振效应向政治公共空间传导，最终村集体为了调和阶层矛盾以政治手段重新调整阶层间的利益关系。

趋于固化的利益分配结构存在调整的可能性是引发阶层冲突的导火索。2016年底，芳村爆发了一次群体性事件，该事件的导火索是芳村被政府征用了一块地，芳村因此获得了6个亿的收入，村干部希望将这笔钱用来给村集体经济提档升级，部分村民有不同意见，认为这笔钱应该按人头平分给村民。这种不同意见迅速被几个想当村干部没当成的村民获取，并在村里煽动中下层村民，“这笔钱放在村里，就是让那些有钱人得好处、吃利息”，很快中下层村民迅速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共同利益，并同时意识到村集体提议带来的相对剥夺的可能性，进而被大范围调动起来，开展游行、静坐、拉横幅等社会活动。

一旦阶层情绪被点燃，阶层冲突就从经济领域向文娱活动领域蔓延，矛盾进一步扩大，中下层对A队在花园广场上跳舞这件事“忍很久

了”，他们砸了A队的音响，阻止她们继续在村民看得见的地方跳舞，阶层之间的矛盾，从潜在的针对转向了显在的不满。

满足中下阶层的诉求，是抚平其阶层情绪，缓和阶层冲突的关键。芳村全村总人口才1600余人，但参与这次群体性事件的就达到了超600人之多，整个事件持续了近一个月，村干部完全控制不了局势。最后在镇政府的介入下，通过下派武警官兵严守、严惩带头闹事的人、撤换芳村的村书记、禁止A队的成员们在村里跳舞、承诺清算村集体对村民的负债等方式才将此次事件平息下去。2017到2018年2年时间里，芳村将2.2亿村民集资减少到不足8000万，宣布村民集资“只出不进”——即村民只能退出集资，村集体不再进行新的集资，村集体经济内部不再制造制度化的分配不均衡。对于社会领域的冲突，村干部反复找A队伍的组织者，希望她们不要再在农民花园里跳舞，甚至不要在其他村民看得见的地方跳舞，建议她们去外面找其他的广场、舞馆跳舞，村里可以通过一定的形式给她们一点补贴。芳村妇联主席说，“她们这群A队成员们太高调了，容易刺激其他村民敏感的神经，挑起矛盾，把村里的公共活动场所让给其他村民，这是风险最小的办法”。

然而事实上，土地要素配置上的不均衡以及这种不均衡结构的固化，才是芳村阶层分化异常顽固的根本所在，若不改变，它将一直是芳村的治理风险所在。土地要素配置不均衡若长期存在，芳村的阶层分化也将长期存在且极少有阶层流动，进而对立的阶层意识和阶层矛盾也将长期存在，成为芳村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

## 七、余论：熟人社会公共空间的共振性及其迁移

熟人社会生产、生活和政治的三位一体性，使熟人社会不同领域之间交织成了一张错综复杂、密切关联的网，这张网成为不同形式公共空间之间发生高度共振效应的传感器，阶层分化

这种原本发生在经济公共空间的现象,最终给村庄社会带来了系统性的影响,尤其是导致了阶层意识的形成、孕育了阶层冲突的可能性。

宏观社会公共空间的“碎片化”,对公共空间共振效应的形成具有缓冲效果。共振的公共空间是阶层分化在熟人社会中引发系列反应的重要环节,但是公共空间的共振效应并不仅仅存在于微观的熟人社会中,宏观社会公共空间的共振效应也可以在一定外力作用下形成,意识形态的教育、新闻媒体的传播和政治组织的带动都是促成共振效应的外力。而宏观社会之所以需要外力,缘于在宏观社会中不同形式公共空间内部的“碎片化”,这种“碎片化”可能产生于地域差异也有可能产生于制度差别,并且因为这种“碎片化”,不同形式公共空间之间的关联性较弱,导致公共空间的高度共振效应缺乏必要且敏感的传感器。

但是,“碎片化”的宏观社会公共空间存在整合的可能性,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共振的公共空间是在微观社会和宏观社会之间进行知识迁移的阶层分析概念。以城乡二元结构为例,在我国逐步取消农民进城务工的政策限制后,农民可以自由的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但城市资本并不能自由进入农村获取土地,《宪法》规定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了农村土地具体的承包关系,这样的二元结构让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器”<sup>[27](P48-55)</sup>;也有学者认为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是“倒丁字型”的宏观社会分层结构,农民和农民工都处在这个倒“丁”字的底端,并指出这样的分层结构蕴藏着极大的社会治理风险,认为中国社会想要缓解这种社会紧张,需要逐步走出“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sup>[28]</sup>实践证明,经济下行压力下,农民进城务工受到极大的阶段性影响,但这种经济公共空间中的大事件并没有带来政治公共空间的共振。共振没有发生的根源在于农民都有回得去的、能够安身立命的农村<sup>[27]</sup>,在于农村的经济公共空间和城市的经济公共空间的相对分离。宏观社会中经济

公共空间的二元性使发生在某一个经济公共空间的危机并不会成为整体经济危机,进而这种原本可能导致政治公共空间共振的效应,被经济公共空间内部二元性带来的弹性内化了。在宏观社会中,经济公共空间的二元性、文化价值公共空间的多样性和社会交往公共空间的地域性,共同形塑了不同形式公共空间之间的弱关联和低共振状态。宏观社会公共空间的弱共振效应是维系当前我国分化社会总体稳定的重要机制,这种机制的内在结构是什么以及如何继续维系,都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 参考文献:

- [1]李强. 社会分层十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 [2]仇立平. 回到马克思: 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J]. 社会, 2006(4): 23-42, 206.
- [3]杨华. 农村阶层研究的范式论纲: 实体论与关系论[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3): 11-17.
-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5]马克斯·韦伯.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6]DAHRENDORF R.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7]李培林, 张冀, 赵延东, 梁栋. 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 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8]李强. 当前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J]. 江苏社会科学, 2004(6): 93-99.
- [9]杨华. 农民分化程度与农村阶层关系状况[J]. 人文杂志, 2014(7): 122-125.
- [10]贺雪峰. 熟人社会中的阶层分化[J]. 决策探索, 2016(1): 86.
- [11]杜鹏. 熟人社会的阶层分化: 动力机制与阶层秩序[J]. 社会学评论, 2019(1): 65-74.
- [12]杨华, 杨姿. 村庄里的分化: 熟人社会、富人在村与阶层怨恨[J]. 中国农村观察, 2017(4): 116-129.
- [13]李婷. “熟人社会”中的农村阶层关系[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2): 62-71.
- [14]杨华, 袁松. 阶层竞争: 农民上访的一个解释框架——基于浙江G镇调查[J]. 思想战线, 2018(4):

96-107.

[15]印子. 浙北农村社会阶层区隔化及对村庄治理的影响[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2): 97-106.

[16]李婷. 阶层分化下的村庄派性选举于民主决策——基于浙东N县D村的调查[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 40-50, 145.

[17]朱战辉. 农村人情的而阶层化表达与运作机制分析——基于浙东农村经验调研[J]. 社会科学论坛, 2018(3): 180-188.

[18]哈贝马斯. 公共空间与政治公共领域——我的两个思想主题的生活历史根源[J]. 哲学动态, 2009(6): 5-10.

[19]朱海龙.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与中国农村公共空间[J]. 科技创业月刊, 2005(5): 133-135.

[20]曹海林. 乡村社会变迁中的村落公共空间——以苏北窑村为例考察村庄秩序重构的一项经验研究[J]. 中国农村观察, 2005(6): 61-73.

[21]宋丽娜. 熟人社会的性质[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2): 118-124.

[22]贺雪峰. 治村[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23]杜鹏. “面子”: 熟人社会秩序再生产机制探究[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4): 63-73, 147-148.

[24]贺雪峰. 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M]. 上海: 东方出版社, 2019.

[25]贺雪峰. 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J]. 开放时代, 2008(3): 51-58.

[26]魏程琳. 中国乡村的去阶层分化机制与社会稳定[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 30-39, 145.

[27]贺雪峰.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M]. 上海: 东方出版社, 2014.

[28]李强. “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J]. 社会学研究, 2005(2): 55-73, 243-244.

【责任编辑 史敏】

## Acquaintance Society, Class Differentiation and Resonance of Public Space —A Micro Experience Narrative to Understand the Formation of Class Consciousness

CHEN Wenqi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micro-experience narrative of Fangcun Village in Donggua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how it is possible for villagers who have been divided into different strata to form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even class actions in their acquaintance society. The study found that, first of all, a certain characteristic of the acquaintance society provides natural convenience for class interaction, which is a highly resonant public space. Secondly, in the acquaintance society, public space is composed of public life represented by human relations, public place represented by squares, publ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dentity represented by collective members, and public value represented by face. Thirdly, the stratum differences in acquaintance society are visual and visual, and the stratum interaction is inevitable. The high resonance of public space forces the stratum difference and stratum interaction into the daily life of the acquaintance society and participates in the reproduction of public rules. Fourth, if the differentiated class structure tends to solidify, the class consciousness of the loss of the weak class and the sense of superiority of the strong class will form and accumulate in intuitive differences and forced interaction. Finally, this set of opposing class consciousness becomes an objective political risk of acquaintance society, and may release its opposition in the form of class conflict.

**Keywords:** acquaintance society; class differentiation; class consciousness; class conflict; resonance of public space